

鲁迅研究

集刊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研究鲁迅的准绳与指针
-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
- 关于《野草》的通信
- 谈鲁迅生前《阿Q 正传》的外文译本
- 心中的碑铭
- 只研朱墨作春山
- 中国版画与我
-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王 瑶
李 泽厚
王 西彦
戈 宝权
白 兮
王 朝闻
内山嘉吉
江 丰

鲁迅研究集刊

(一)

本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字：费 新 我

装 幀：朱 展 程

鲁 迅 研 究 集 刊

第 一 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 海 绍 兴 路 74 号)

本 社 编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1979 年 4 月第 1 版 197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书号：10078·3049 定价：1.40 元

目 录

鲁迅研究的准绳和指针

——学习毛主席关于鲁迅的光辉论述·····王 瑶	1
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李泽厚	31
论鲁迅马列主义世界观的确立	
——兼批石一歌的有关谬论·····严家炎 袁良骏	62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的考察·····孙玉石	86
论《狂人日记》·····孙中田	118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桑逢康	154
关于《野草》的通信·····王西彦	182
读诗二题·····姜德明	195
论鲁迅小说的风格和语言·····陈鸣树	206
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两则·····储大泓	243
鲁迅与裴多菲·····兴万生	268
鲁迅对沙俄霸权主义的揭露和对普希金的批评	
·····刘再复 张 琢	286
心中的碑铭·····白 兮	306
鲁迅二次见陈赓·····楼适夷	311

只研朱墨作春山·····	王朝闻	315
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前进·····	李 桦	318
回忆鲁迅琐记·····	刘 岷	328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 丰	332
内山嘉吉夫妇		
——鲁迅的日本朋友·····	李连庆	342
中国版画与我·····	内山嘉吉	350
谈鲁迅生前《阿Q正传》的外文译本·····	戈宝权	371
帮闲·帮忙·帮凶		
——还石一歌庐山真面目·····	吴中杰	399
鲁迅不容歪曲,历史不容篡改		
——批石一歌两篇评法黑文·····	蓝 海	412
编 后·····	编 者	423

鲁迅研究的准绳和指针

——学习毛主席关于鲁迅的光辉论述

王 瑶

鲁迅的作品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都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依据。毛主席给了鲁迅最深刻最科学最全面最崇高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又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呢？

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伟大的革命家逝世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列宁全集》第23卷117页）。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也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诩，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鲁迅死了以后，虽然许多人都说他伟大，但是有一些人是歪曲他的，是利用宣传鲁迅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尽管现在没有象高长虹那样赤裸裸地攻击鲁迅的人了，但是有些人的手段之毒辣和阴险，是远远超过那些公开地反

对鲁迅的人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是这样的“蛀虫”。他们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一方面拚命限制、破坏和扼杀关于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以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出版过加注的《鲁迅全集》和一本象样的《鲁迅传》；一方面他们又组织御用的写作班子，专门打着鲁迅的旗号来贩运私货，把那些毒汁四溅的反动文章贴上研究鲁迅的标签，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服务。例如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所写的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叫作《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和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1976年3月13日《文汇报》），就是一篇典型的歪曲鲁迅、进行反革命叫嚣的大毒草。它叫嚷什么揪“辫帅”、追“后台”，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这算什么学习和研究鲁迅呢？我们都知道阿Q和小D的“龙虎斗”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阿Q还要经过“从中兴到末路”才能遇上辛亥革命的发生，他们怎么可能在革命尚未发生之际就团结起来反对所谓复辟派“盘辫党”呢？而且就在《风波》中也根本没有提出什么“辫帅”、“后台”的问题。“四人帮”一伙有的从三十年代起就是攻击鲁迅的，有的则在五十年代就写过专门歪曲鲁迅的书籍，到他们近年来组织写作班子、加紧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的时候，虽然表面打着宣传鲁迅的旗号，实际上却伪造材料、颠倒历史，信口胡扯，混淆是非，炮制了许多歪曲鲁迅的毒草文章。所以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是否肯定鲁迅来看一些文章的正确与否，而要看它的论点是否符合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历史的具体分析。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就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判断是非曲直的锐利武器。如果我们用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来衡量四十年来大量有关鲁迅的书籍和文章中的观点，那么就主要方面讲起来，我觉得在三个问题上有些人是同毛主席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的。现在我

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论鲁迅的体会。

第一个问题，鲁迅究竟是“一家”还是“三家”？是单纯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同时也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第二个问题，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某些人却说鲁迅是革命的同路人、是同情革命的。究竟是同情革命的同路人呢，还是文化革命的主将？既然是主将，就不是仅仅表示同情的团结对象。在这个问题上两种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第三个问题，毛主席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十年“围剿”中成了文化革命的伟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就是说鲁迅是共产主义的战士，特别是在他的后期；而有些人则说鲁迅是人道主义者。究竟鲁迅是共产主义战士还是人道主义者？

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些人的著述和他们的论点，就知道对鲁迅的评价今天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就可以加强我们对毛主席论述的深刻性的理解。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正确地评价鲁迅呢？就因为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而鲁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那些抱有错误观点的人，情况也不尽相同。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是有意歪曲；另外一些人，则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关系。他们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不能正确理解鲁迅的伟大成就；我们过去写了一些错误文章，原因也在这里。关于以上三个问题的错误观点，我们可以举出某个鲁迅研究者作为代表，因为他表现得最集中。他写了三本关于鲁迅的书，在香港出版，里面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他就认为鲁迅绝不是一个革命家，而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只是同情革命而不是革命家。他的观点主要就集中在上述三个问题上。别人的论点没有他这样集中，但是类似的观点还是很多的。所以我想就这三个问题谈谈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第一个问题：鲁迅究竟是“一家”还是“三家”？究竟鲁迅单

纯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当然是伟大的文学家。这一点并不错。许多外国人的著作，我们四十年来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讲的；但有些人强调他是文学家，目的在于不承认他是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们就是强调鲁迅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们说，鲁迅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他的一切实践（包括创作实践）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革命；如果脱离了革命家来谈文学家，那鲁迅就成了为他一贯所憎恶，决不要他儿子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了；也就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不知道文艺是干什么的人了。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鲁迅的文学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首先从他的创作意图来看。他是自觉地在文学领域、文艺战线进行战斗的。鲁迅有好几篇文章讲他为什么要搞文学，为什么写起小说来和他怎么来开始写小说的。他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是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精神，抱着毁掉“铁屋”的强烈愿望，使文艺为人民革命服务的。他的作品也确实起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革命作用。他曾说：“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上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他对文学和革命的关系，从来是摆得很正的，他的作品是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我们知道，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因为日本明治维

新与介绍西方医学有关，而且中国如果发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可以当军医。他学医是为了救国。他改学文学，目的并没有改变，只是认为文学是一件更切要的事情，是用来提高人民觉悟的有效工具，可以对革命作出更好的贡献。所以不论写小说或写杂文，他的意图都是明确地为了改造社会，就是要为革命事业服务。他从“五四”起就知道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他的小说的内容用鲁迅自己的话来概括，写的是“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些语言都还不是明确的阶级分析的语言，但是很明显，鲁迅已经看出了社会上有阶级对立，看出了社会上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而且自己是鲜明地站在下层社会的被压迫者这一边，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斗争。他自己讲得很清楚，当时中国是一个铁的黑屋子，大家都昏沉沉地睡觉，他要唤醒他们，起来把这个铁屋子砸烂。他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是为社会改革服务的。所以他从来就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而且不仅是从“五四”开始，实际上从鲁迅从事文学起，从清末起，鲁迅就是革命家，辛亥革命以前他就参加了反对清朝统治者的革命活动。但在那个时期，他从事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当时属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并且以文学作武器，宣传进步思想，希望能够提高人民的觉悟，改变国家的面貌。从“五四”开始，在十月革命以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服从于人民革命的任务和要求的。所以从鲁迅自己的创作意图来讲，并不是为了当文学家，不是为了想写一部不朽的作品，而是为了用文学作武器，来改造社会。杂文也是一样，他并不想让他杂文永久流传下去，他只希望他所抨击的那种社会现象很快消失，那末他的杂文也就可以消失了。他从来是把文学作为一种革命的手

段，斗争的武器的。

关于“思想家”也是一样。我们一谈到思想家，就很容易用资产阶级的传统观点来看问题，以为看一个人是不是思想家，首先看他是否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逻辑性是否严密，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我们认为不能简单这样看。我们看一个思想家，首先看他的思想符合那个阶级的要求，看他是为了说明世界还是为了改造世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为了说明世界的，而一个革命者，他必然是以革命实践为前提的，他把思想看作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就象毛主席说中国人从西方寻找思想武器那样。找武器是为了战斗的，如果发现这个武器不适用，不解决问题，他就要去另外寻找更锋利更有效的武器。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革命家的基点来理解思想家的鲁迅，因为他是为了改造世界才掌握思想武器的。他发现医学能救国，他就学医，后来发现医学只能救个别人的生命，要使中国人都觉悟起来，最有效的是文学，于是他就把文学当作主要手段。当然革命并不是只用文学就能成功，鲁迅也不是要大家都当文学家，而是把文学作为自己从事革命的具体工作。他确实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但他从来是有自己的批判抉择的标准的，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一直到他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最好的武器以前，他的思想基础就是以彻底地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而这正是以革命家为出发点的。

所以，从创作意图看，“三家”是统一的。我们决不能脱离了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考察鲁迅的文学成就，把他只当作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我们从鲁迅作品的社会效果来看，那就更清楚了。

毛主席正是从社会效果上来评价鲁迅的。毛主席在《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看一个作家是否正确，是看他的作品，看他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主席给鲁迅这么高的评价，正是从鲁迅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对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考察的，所以毛主席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只有革命家的作品，才能有对敌冲锋陷阵的作用。

我们常说鲁迅的思想分前后期，这是不错的。毛主席说：“鲁迅后期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是鲁迅思想可以分为前后期；第二是后期没有片面性，前期则还有点片面性。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前期后期是有连贯性的。比如对于谁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他从来是很明确的；并不只是后期，前期就很明确。我认为，鲁迅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一个受剥削的农民，他很清楚谁是他的敌人，那就是压在他头上的地主老爷。这并不需要很高的理论水平。鲁迅对于谁是我们的敌人很早就非常明确。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不管是谁，“全都踏倒他”。这是他前期的文章。究竟什么社会力量妨碍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呢？当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在鲁迅的笔下，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非常明显。这是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的。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正是从他的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考察的。也就是从鲁迅作品跟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评价的。

我们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象我们这样六十多岁年纪或者比我更大一点的人，从我们开始接触一些书报杂志开始，就是在

鲁迅的作品哺育下成长的。鲁迅的作品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哺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成长，到了现在，更为广大的工农兵所热爱，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从民主革命到今天，一直起着宣传革命思想和推动革命前进的作用。鲁迅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伟大贡献，是非常明显的。这里并没有忽略他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一个文学家如果真正伟大，他就必须具有革命思想和忠实地为革命服务。鲁迅正是这样，他的基本出发点是一个革命家。

第二个问题：鲁迅究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同路人？

主将和同路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路人就是说他不是革命队伍的基本成员，不过是可以同走一段路的人，走到什么地方分手也说不定。主将则是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既然是主将，就决不是同路人。

有些人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大理解，特别是鲁迅前期。他们认为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那么他的主将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鲁迅则不但不是党员，而且他在前期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感到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它的主将竟然不是马列主义者，觉得很不好说。于是有些人就认为毛主席指的是鲁迅的后期，不是前期。这种理解是不对的。因为毛主席讲得很明确，“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文化思想，而且这支文化新军二十年来建立了伟大的功劳，简直是所向无敌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一九四〇年写的，二十年来当然是指“五四”以来；并且紧接着说，“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明明白白是说“五四”以来鲁迅就是伟大的旗手，

是不应该发生任何误解的。

对于鲁迅的“主将”地位，在革命文艺运动中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有一些革命文学阵营内的同志也曾把鲁迅说成是革命的同路人（其中许多同志后来改变了这种观点，遵照毛主席的评价，确认了鲁迅的“主将”地位），特别是鲁迅的前期。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批评鲁迅的时候，冯雪峰是不赞成的，他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认为鲁迅是革命的“追随者”，应对之采取“宽大态度”，因为鲁迅并未“诋毁革命”。这就是说鲁迅是同路人。瞿秋白说鲁迅反对绅士，是革命的“诤友”，也是说鲁迅是同路人；他在《答〈福建民报〉记者问》中说鲁迅“只能算为同路人”。以后有些同志也讲过类似的话。同路人当然就不是主将了。关于鲁迅后期的争论不大，因为毛主席已经讲鲁迅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那当然就是主将了；但关于前期，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领会主席的话，“主将”是从“五四”算起的，而且即使在鲁迅的前期，也是可以称之为将的。

鲁迅前期从世界观上说确实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也不同意瞿秋白以及许多人所说的鲁迅前期是进化论者。毛主席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说，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窝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一类思想武器，但是这些武器“软弱得很”，到“五四”的时候就“宣告破产了”。我们不能设想一支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浩浩荡荡的，但它的主将拿着的却是一种已经破产了的武器。所以鲁迅前期的思想是不能用进化论来概括的。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鲁迅是进化论者。鲁迅自己确实说过“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还说过他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才救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这又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必须从鲁迅和进化论的关系来进行一点具体分析。鲁迅谈到他和进

化论关系的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朝花夕拾》里的《琐记》，是记他在青年时代怎样开始接触严复译的《天演论》的，那时他在南京。另一篇是《三闲集·序言》，讲他过去一向相信进化论，后来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鲁迅从《天演论》中第一次接触到进化论思想，这本书是英国赫胥黎写的，他是个达尔文主义者，本来的书名是《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把它翻译成《天演论》，他只翻译了前两篇。总的来说，这本书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内容主要是讲生物进化的达尔文学说。鲁迅当时学的是自然科学，他接触进化论主要也是从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理解的。鲁迅留学日本的时期，进化论在日本很流行，鲁迅看了很多关于达尔文主义的书籍，都是关于生物进化的。我们现在从《坟》的《人之历史》一文就可以看到鲁迅当时所接受的影响。《人之历史》着重介绍了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是一篇专门介绍生物进化学说的论文。海克尔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创立了生物进化系统图，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赞扬了海克尔学说的战斗性：“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大快人心的事。”鲁迅正是从生物进化学说的科学性和战斗性来加以介绍的。关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马克思曾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27页）因为达尔文考察了生物和环境条件的关系，发现了生物演变和发展的规律；达尔文主义是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进化学说）之一，是唯物主义思想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胜利。列宁曾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称为“最新科学进化论”（《第二国际的破产》），可见在生物学范围内，达尔

文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鲁迅是在他学医的时候深入研究进化论的，所以他接受的主要也是关于自然科学的范围。如果把进化论简单地应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是说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列宁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运到社会科学的领域，就会变成空话。”（《列宁选集》第2卷336页）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核心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生物的生存必须适应外界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各种生物为了生存互相竞争，条件良好、能够适应环境的就能够生存下去，那些不能适应的就被淘汰而灭亡了。古代有很多生物，现在已经没有了。存下来的就是优良的，淘汰掉的就是不良的，这叫做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规律，在生物进化史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它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赫胥黎就是这样理解的。这不仅因为自然界的变化非常缓慢，人类社会的变化很快，更重要的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形成了社会，他对于自然环境不是处于被动的适应状态，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因此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仍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把生存竞争和优胜劣败这套理论直接应用到社会上，就只能替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只能说明剥削和侵略是有理的，而受欺凌则是活该，那当然是极反动的。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即二十世纪初期，在西方很流行。鲁迅则不仅没有宣传过这种思想，而且对它是批判的。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时曾受到尼采的一点影响。尼采是很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人类要进化到比人更高级的“超人”，就象人比猴子更高级一样，所以他歌颂强者，让弱者尽快死亡。鲁迅从一开始起就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一九〇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把尼采和拜伦作了比较，他说拜伦“正异尼法”（即尼

采),“故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指拜伦)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他显然是赞同拜伦的。一九一八年他就反对尼采说的“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的主张,而赞成“扶他一下”(《集外集·渡河与引路》)。这很容易理解,处在帝国主义强力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决然无法接受歌颂强者而要弱者消亡的思想,而只能是要求“力抗强者”的。他曾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这正是对于颂强凌弱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因为他痛感到“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坟·杂忆》)后来鲁迅考察了进化论学说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了批判。他说:“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二心集·〈进化与退化〉小引》)这里所说的论客的误解,正是指社会达尔文主义。鲁迅认为他们是歪曲了进化论的。在一九〇八年写的《破恶声论》里,他把借着进化论来为帝国主义者侵略弱小国家辩护的人斥为“兽性爱国之士”,他指出:“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巨仆不嫌也。”他对用“进化留良”来为侵略者辩护的人表现了极大的愤慨,而他开始介绍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动机,就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坟·杂忆》)可见鲁迅从来就是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划清了界限的。毛主席在《矛盾论》里从哲学思想上批判了庸俗进化论,庸俗进化论认为事物变化是渐进的,不承认飞跃,不承认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的斗争。毛主席说他们只承认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不承认性质的变化。庸俗进化论是一种形而上学,是根本违反达尔文